

江

戴光中著

北

儒  
商

作家出版社



江北儒商

戴光中 著

I25  
128)

作家出版社

## 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江北儒商/戴光中著. - 北京: 作家出版社, 2009.6

(守望者文丛)

ISBN 978 - 7 - 5063 - 4754 - 9

I. 江… II. 戴… III. 纪实文学 - 中国 - 当代

IV. I2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9) 第 090161 号

## 江北儒商

---

书名：江北儒商

作者：戴光中

责任编辑：陈 华

出版发行：作家出版社

社址：北京农展馆南里 10 号 邮码：100125

电话传真：86 - 10 - 65930756 (出版发行部)

86 - 10 - 65004079 (总编室)

86 - 10 - 65015116 (邮购部)

E - mail：zuojia@ zuojia. net. cn

<http://www.zuojia.net.cn>

印刷：北京华忠兴业印刷有限公司

成品尺寸：145 × 210

字数：140 千

印张：6

版次：2009 年 6 月第 1 版

印次：2009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

ISBN 978 - 7 - 5063 - 4754 - 9

总定价：120.00 元 (本册：20.00 元)

---



作家版图书，版权所有，侵权必究。

作家版图书，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。

宁波市哲学社会科学规划课题  
宁波市甬商研究基地课题

### 《江北儒商》编委会

主任：毛溪浩

副主任：江 鲁 王伯宁 周明力 徐培荣

委员：戴雪嵘 周少植 王 静 褚 鸣

## 《江北儒商》序

素有“儒魂商魄”之称的江北，儒家文化和经商传统都很悠久。江北的一些名门望族，世代有人登科入仕；同时也有人经商致富。他们神奇地做到了既读书做官，也经商赚钱，尊儒重商，义利并举，相辅相成，相得益彰。至迟在北宋时期，江北慈城五马桥冯氏已经以经营药业而致富。至明清时，江北慈城的大家巨族几乎都在经营药业。悠久的商业传统和频繁的商业活动，使慈城成为近代中药业经营者的摇篮，也影响了地域文化中的物质价值取向，使地域文化中的中坚——士人对商业文化不是排斥，也不鄙弃，而是保持宽容的态度。明代江北（原慈溪）人和宁波府的其他属县一样，“竞贾贩锥刀之利，半食于外”。明代后期，慈城商人已在北京建立会馆。入清后大批江北人纷纷弃仕从商，有的家族还以宗族之财力和人才在商业竞争中一展雄风。像慈城冯氏、王氏、陈氏、郑氏、罗氏、庄桥童氏、张氏等那些诗书传家的大族，无不投入到走南闯北学计然策的行列。19世纪下半叶，随着上海崛起，大批江北人移师上海，在十里洋场闯荡拼搏，纵横捭阖，同乡相扶，同业相助，成为上海商界中最

有竞争力的地方商帮——“宁波帮”的重要组成部分。

儒商面对的是变幻多端和波涛起伏的商海。唯有意志坚定、才干卓越、知识丰富者才能适应。江北儒商从小接受儒家教育，耕读传家，同时又受黄宗羲“工商皆本”、“经世致用”理论的熏陶，这方面最为典型的就是咸丰时慈城巨富冯云濠。在致富同时，他不但建有浙江著名藏书楼——醉经阁，还与同府学者王梓材合作，完成了《宋元学案补遗》一百卷。博学是他们从业的学习观。

儒商在义与利、质与量、合作与竞争的商业伦理关系上，主张和谐统一，不能失之偏颇，更不应把赚钱当作经商的唯一目的。江北儒商具有慈孝为本，急公好义为特征的伦理价值取向。父慈子孝、兄友弟恭是被推崇的家族成员关系的品行；急公好义、乐善好施是最受人景仰的品格；肝胆相照、任侠利人是极被推崇的德行。只要随意翻阅江北儒商某一家的宗谱，都能看到那些商人捐钱捐地造福桑梓，反哺故里的善举。经商必须信为上，诚为本。诚信是他们的市场观。

儒商把自强和自律集于一身。他们摒弃那种“无商不奸”、“从商必奸”的自私哲学，始终坚持“富而有仁”的经商原则。无论是从事中药业、还是金融业，始终恪守“诚信为本，义中求利”。如庄桥张氏家族经营的杭州张同泰国药号“悉遵古法务尽其良；货真价实存心利济”的经营理论，正是这一原则的最好体现。自律是他们的人生观。

为了深入挖掘江北的历史文化底蕴，进一步凸现江北历史文化名城的城市个性，传承江北的文化发展脉络，促进江北文化大

区建设，经江北区文联牵线，江北区委统战部和江北区工商联于去年3月份邀请宁波大学宁波帮研究中心主任、江北区文联副主席戴光中教授撰写了《江北儒商》一书。这本书把江北儒商产生的条件、社会构成、活动区域、所经营的行业以及儒商中的代表人士等几个方面作为研究的重点，通过对上述几个方面的研究，基本勾勒出了江北儒商的特征、贡献和影响，提炼了江北儒商的精神内涵，特别是江北源远流长的慈孝文化对他们的影响，儒商所体现出来的“富而有仁”和“以慈孝为本心，用慈孝惠大众”的慈孝文化的精神实质。同时也从一个侧面展示了江北丰富深厚的历史文化内涵，展示了江北岸的文化亮点，展现了江北大地人杰地灵、人文荟萃的独特魅力。正是在这个意义上，我认为该书值得一读。

是为序。

俞雷

(俞雷同志系中共宁波市江北区委书记)

# 目 录

## 第一章 导论

### 地利人和

一、天时不如地利.....	2
二、地利不如人和.....	6

### 特色行业

一、中医药业 .....	11
二、金融业 .....	14
三、航运业 .....	17
四、买办业 .....	19
五、银楼业 .....	21
六、针纺业 .....	23

## 第二章 儒商世家

### 慈城冯氏家族

一、书香名门 .....	26
二、药业世家 .....	31
三、钱业巨子 .....	36

### 黄山王氏家族

一、中日民间文化使者 .....	41
二、天津甬商买办之家 .....	49

### 庄桥马径张氏家族

一、“马径张”外交双杰 .....	58
二、“张同泰”五代传人 .....	64

## 第三章 商界领袖

### 严信厚与上海商务总会

一、红顶儒商 .....	73
二、商会领袖 .....	77

三、后继乏人 .....	82
--------------	----

### 四大恒与北京银钱业

一、主人之谜 .....	87
二、钱业至尊 .....	90
三、灭顶之灾 .....	95

### 第四章 商帮精英

#### 童姚村人“童涵春”

一、善长创业.....	101
二、祥权中兴.....	105
三、不务药业.....	110

#### 江北岸人周宗良

一、谦信买办.....	115
二、德孚总买办.....	119
三、民族意识.....	125

#### 半浦村人孙衡甫

一、力挽狂澜.....	129
-------------	-----

二、全面出击.....	134
三、走向没落.....	138

### 慈城镇人秦润卿

一、小试牛刀.....	142
二、稳执牛耳.....	147
三、俯首为牛.....	153

### 慈城镇人应昌期

一、理财高手.....	158
二、多元经营.....	161
三、黑白诺贝尔.....	168

# 第一章 导 论

“江北儒商”，特指宁波市江北区籍的工商金融界人士，所以开宗明义，首先要明确两个概念。一是“江北”的境域，二是“儒商”的内涵，以此作为本书论述的基础。

宁波的“江北”，最早并非严格的行政区划，而是指鄞县古城区北面隔姚江相望的一小块地域，俗称“江北岸”，隶属鄞县，其境域大致与今之中马街道相等。它因鸦片战争后宁波被辟为通商口岸之一、在这里设立“外人通商居留地”即全国第一个“外滩”而闻名。然后到1952年9月，江北区人民政府成立，它才是真正意义上的行政区划，所辖区域大致为今之中马、白沙等地。而本书所指的“江北”，则是在1984年2月经国务院批准的“新江北区”，其境域除了中马和白沙两个街道，还包括今之慈城、洪塘、庄桥、文教、甬江、孔浦等地。

所谓“儒商”，目前至少有10种诠释。比较通行的说法，是指有道德、有文化、有国家社稷理想的商人，是具有“儒魂商才”的经营管理者。儒商与一般商人最本质的区别，就是非常重视商业道德，“诚信为本，义中求利”；而获利之后，应当“得之於社会，用之於社会”。这就是近现代的“儒商精神”。

所以，凡是由“新江北区”这方水土哺育培养、古往今来

从事经商活动的人士，不管其原来的籍贯是鄞县、慈溪，抑或镇海，均为本书的研究对象；而重点在于成就卓著、具有儒商精神的已故人士。

## 地利人和

### 一、天时不如地利

“天时不如地利，地利不如人和”。孟子说这句话，主要是指地理优势和人文因缘对于战争、外交的重大影响。实际上，经商何尝不是如此？地域偏僻，交通闭塞，哪里会有商机？而优越的地理环境，必然会促进当地的经济与商贸。

宁波三面临海，南通闽粤，东接日本，北与朝鲜半岛相望，又恰好处于我国东部海岸线的中段，并且拥有天然良港，乃海道辐凑之重地，扼南北水路之要冲。早在唐代，明州港就有南北海运，并开辟了至日本、高丽的航线。船只从三江口出发，经甬江出海，直达各地港口，是东方“海上丝绸、陶瓷之路”的始发港之一。而宁波的内陆航道，也早已畅通便捷。海上船只从镇海入港，经甬江到三江口，溯姚江而上，经过浙东运河至杭州，再由京杭大运河北上，可抵达北京以及中原各地。虽然，中国古籍中罕有商业航运的文献，但在 520 年前，曾有一位名叫崔溥的朝鲜国官员，在他的《漂海录》中记载了这段水路航线的亲身经历，可供参考。

明弘治元年（朝鲜成宗十九年，公元 1488 年），崔溥因遭暴风，漂流到中国台州，被送至宁波，由水路去北京，转道回

国。其中写道：闰正月二十九日下午，“棹至宁波府城。截流筑城，城皆重门，门皆重层，门外重城，水沟亦重。城皆设虹门，门有铁扃，可容一船。棹入城中，至尚书桥，桥内江广可一百余步。又过惠政桥、社稷坛。凡城中所过大桥亦不下十余处，高宫巨室，夹岸联络，紫石为柱者，殆居其半，奇观胜景不可殚录。棹出北门，门亦与南门同。城周广狭不可知。府治及宁波卫、鄞县治及四明驿，俱在城中。至过大得桥，桥有三虹门。雨甚，留泊江中。”——此处就是今之三江口。

二月初一日，沿姚江而行，到宋石将军庙。“自府城至此十余里间，江之两岸，市肆、舸舰全集如云。过此后，松篁橙橘，夹岸成林。又过茶亭、景安铺、继锦乡、俞氏贞节门，至西镇桥，桥高大。所过又有二大桥，至西坝厅。坝之两岸筑堤，以石断流为堰，使与外江不得相通，两旁设机械，以竹绹为缆，挽舟而过。”再经新桥、开禧桥、姚平处土墓，到达慈溪县城（即今之慈城镇）。“棹入其中，有经元门、钟英门、都堂里门、都宪桥、进士门、德星桥、宝峰门，至临清亭前少停舟。夜，又溯江北，至鸡报，泊于岸待曙。江边有驿，乃车厩驿也。”

初二日，“发船溯西北而上。江山高大，郊野平铺，人烟稠密，景象万千。日夕，过五灵庙、驿前铺、姚江驿、江桥，至余姚县。江抱城而西，有联锦乡、曹墅桥，桥三虹门。又过登科门、张氏光明堂，夜三更到下新坝。”挽舟过坝，天将曙时，又挽舟过中坝，到上虞江。初三日，至曹娥驿，“步至曹娥江，乱流而渡”，至东关驿“复乘船”，“夜四更，至一不知名江岸留泊”。初四日“撑鉴水而上”，到绍兴府后，“复沿湖棹出城外，

过迎恩桥，至蓬莱驿前留泊”。初五日“又溯鉴水而西”，经柯桥铺、钱清驿，夜过萧山县，“至西兴驿，天向曙矣”。初六日，渡钱塘江，到达杭州。

上述文字，正是目前热议中的中国大运河之一部分——“浙东运河”或称“杭甬运河”——的明确记载。由此可以想见，明清以来不知有多少商旅，通过这条黄金水道流向全国各地乃至海外，奔波追求什一之利。而位于姚江和甬江两岸的慈溪、鄞县和镇海三地，无疑比宁波其他区域更占“地利”之优势。诚如清光绪《慈溪县志》卷55《风俗》中所言：当地人“四出营生，商旅遍于天下。如杭州、绍兴、苏州、吴城、汉口、牛庄、胶州、闽粤，贸易甚多（按：县人以贩药为大宗，川湖等省亦无不至者）。或岁一归，或数岁一归，携带各处土仪，馈送亲友。甚至东西南洋诸国，亦措资结队而往，开设店肆，有娶妇长子孙者。”鄞县和镇海的方志中也有类似的叙述。

而对今之江北区来说，由于“外人通商居留地”在这里设立，形成了全国第一个“外滩”，这独一无二的“地利”，更使江北人率先接受西风欧雨的冲击洗礼，在现代化方面得风气之先，涌现出不少大商人、大金融家、大企业家。

海上霸主英国，早已对天然良港宁波垂涎三尺、志在必得。清道光十二年（1832），英国派船来甬侦察，也发现了这条黄金水道的价值，得出结论：“宁波内接运河，外联甬江，乃是一个输出生丝和销售英国货的好港口”；占据了这里，“能更好地控制大运河与大海之间交通，以及可能产生更大更好的政治影响”。（《浙江鸦片战争史料》）所以鸦片战争后，宁波被列入五

口通商城市。1843年12月19日，英国驻宁波领事罗伯聃抵甬。翌年元旦，根据丧权辱国的中英《南京条约》，宁波正式开埠，指定江北岸为外国人通商居留地。因为此地乃姚江、甬江和奉化江的交汇处，江流呈Y型，外国人遂用英语称此地为Y-town，音译“外滩”。——后来“外滩”就成了外商聚集地的别称，著名的上海外滩，其称呼也来源于此。

宁波开埠后，列强纷纷在江北岸“外滩”设立领事馆，修筑可以停靠轮船的码头，开展进出口贸易。但没过几年，由于上海港异军崛起，以其襟江带海、腹地广阔、辟有租界等优越条件，对进出口货物造成挡不住的诱惑。使得相距很近的宁波港优势尽失，原本在这里进出口的贸易物资，纷纷弃甬转沪。这对甬商来说，是危机更是转机。既然上海比宁波更能赚钱，“天下熙熙，皆为利来；天下攘攘，皆为利往”。他们便潮水般地涌向上海，安营扎寨，在十里洋场闯荡拼搏、日益强盛，最终称雄于中国的经济金融中心。而对江北商人来说，开往上海的轮船就停在家门口，当然具有捷足先登的优势，占尽了移师上海的先机。

江北老外滩，一方面是民族的耻辱，另一方面也是东西方文化碰撞、融汇的平台。当时，随着外国货到来的还有大批传教士。1855年，江北岸有成年男性洋人22名，其中14人是传教士。传教士是近代中国西式教育和大众传播媒介的开拓者。这14人也不例外，在江北岸建立教堂，兴办学校，设立医院，创办书局，出版报刊，翻译著作。传教士对近代中国社会变革的作用，主要表现为思想文化的交流，在这里就有一个经典事例——美国传教士丁韪良和庄桥秀才张斯桂互为师生。丁韪良教张斯桂

英语和科技知识，张斯桂教丁韪良汉语和四书五经。后来，丁韪良成为同文馆总教习、京师大学堂总教习，张斯桂成为中国第一艘机械轮船船长。江北人从事现代工商业、买办业的人特别多，显然与江北老外滩密切相关，因为“近水楼台先得月”，最早接受了西方商业文明的潜移默化。

## 二、地利不如人和

“地利不如人和”，是指江北的人文因缘，较之其地理优势更为有力地从深层次推动了儒商的发展。这首先在于浙东学派所提倡的“工商皆本”、“经世致用”等理念的影响。

中国传统的儒家经济伦理，其核心是等级制思想。孔子曾明确表示：“贵贱有序，何以为国？”（《左传·昭公二十九年》）也就是说，在孔子看来，人们对财富的追求及其占有的多少，必须与本人的名位身份等级相符合，否则国将不国。据此，儒家把全国民众划分为“士农工商”四大等级，士居首为尊，农居二为本，工商居后为末，而且这“四民”的社会分工应当世袭化、永恒化，决不可本末倒置。所以中国历来奉行“厚本抑末”、“重农轻商”的经济政策，严厉打击抑制工商人士。但是，浙东学派领军人物黄宗羲，却以时代先觉的眼光，在《明夷待访录》中指出：“世儒不察，以工商为末，妄议抑之。夫工固圣王之所欲来，商又使其愿出于途者，盖皆本也。”他运用当时最先进的标准——是否对社会生产和广大人民日常生活有利——来重新划分和界定“本”与“末”，进而提出“工商皆本”论来对抗